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WANQING XUESHU WENHUA XINLUN

晚清学术文化新论

史革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晚清学术文化新论

史革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学术文化新论 / 史革新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0989-0

I. ①晚… II. ①史…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397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30.5
字数: 428千字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王雪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	1
一、	嘉道年间理学思潮的涌动	1
二、	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契机	7
三、	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	13
四、	理学复兴现象的历史透视	24
第二章	晚清理学经世思想	31
一、“	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结构	31
二、“	求变”、“务实”的基本思想内涵	40
三、	理学经世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58
第三章	晚清陆王心学的复苏与学术论辩	64
一、	王学在晚清时期的复苏	64
二、	程朱陆王之辨的开展	69
三、	程朱陆王调和论的弹奏	85
第四章	晚清汉学的兴衰变迁	95
一、	晚清汉学的局部性发展及其衰落	96

二、晚清汉学的基本特征	109
三、晚清汉学的历史影响与地位	116
第五章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晚清汉宋学的关系	121
一、宗宋学者对汉学的猛烈批判	121
二、“汉宋合流”的学术发展趋势	132
三、晚清汉宋学关系透视	145
第六章 晚清诸子学的萌发与复兴	152
一、晚清诸子学的悄然兴起	152
二、甲午战争后诸子学发展的新局面	160
第七章 16 世纪 60 至 90 年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70
一、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新形势	170
二、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	175
三、西学在晚清传播的历史思考	182
第八章 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学术文化	191
一、揭示了中国近代新文化主导精神	191
二、新型知识群体的最初集结	194
三、对近代新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	197
四、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200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近代科学传播	203
一、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科学传播途径的扩大	203
二、辛亥革命时期输入的科技新知和传播主体的转换	211
三、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科学思想的进步	218
第十章 20 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29
一、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酝酿	229
二、20 世纪初年的西史东渐	231
三、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及其基本主张	235

第十一章	西学对晚清学术的影响	243
一、	援西学入儒学的初尝试	243
二、	借鉴西学，破旧立新	245
三、	对西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251
第十二章	陈寿祺与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256
一、	兼汉宋、博古今的通儒	256
二、	“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	263
三、	开学术新风的一代名师	268
第十三章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275
一、	探求理学的思想历程	275
二、	基本理学观念	280
三、	“理学经世”论的代表者	289
第十四章	倭仁与晚清理学	293
一、	恪守程朱理学道德论的一代儒宗	293
二、	在新旧文化冲突的潮流中	297
三、	理学主敬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302
第十五章	黎庶昌的“亚经”说及改革科举议	305
一、	以“亚经”辅经说	305
二、	改革科举议	309
第十六章	梁启超研究宋明清理学的学术历程	313
一、	早岁对理学的研习	313
二、	破除蔽障，启蒙为先	316
三、	出入于学术研究和启蒙精神之间	323
第十七章	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	338
一、	沐浴中西文化风雨激荡的洗礼	338

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健将	341
三、阐明科学与民主的内涵，构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内容	347
四、“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362
第十八章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371
一、用民权说抨击旧的国家理念	371
二、用进化论阐明国家的起源	375
三、关于国家内涵的阐述	378
第十九章 章太炎的社会思想	385
一、章太炎社会观的形成	385
二、“熔中西学为一炉”的社会思想	388
第二十章 章太炎的佛学思想	403
一、章太炎习佛心路历程考察	403
二、章太炎对佛学思想的阐发	414
三、章太炎习佛原因透视	425
第二十一章 刘师培与晚清学术	433
一、近代学术研究的多方面成就	434
二、近代学术研究的思想特色	446
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452
第二十二章 王韬与近代西学的传播	457
一、传播西学的宣传家	458
二、引进西学的文化活动家	460
三、引进传播西学的特点	466
四、瑕不掩瑜的历史功绩	473
代后记	478

第一章 程朱理学与晚清 “同治中兴”

目前学界关于晚清理学及“同治中兴”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但是，对于晚清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颇具新意且研究薄弱的课题。笔者试图通过对二者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阐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一、嘉道年间理学思潮的涌动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治朝无论如何都是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在此期间，清政府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与西方列强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并发动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内政改革——洋务运动。到1875年光绪帝即位之初，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已经消散，国家出现了些许振兴的气象。也是在这年，浙江学者陈弢编辑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声称：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溃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①他把“同治中兴”归功于这个时期“辈出”的“豪俊”所为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些“豪俊”中，就包括一大批讲求理学的官僚士大夫。理学与所谓“同治中兴”之间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

所谓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心性之学、道学，因其基本上形成于两宋时期，亦有宋学之称。理学在由宋至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前者受到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扶植，被奉为官方哲学；后者大体处于儒学在野学派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受到正统

^① 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

学派的长期压抑。程朱理学既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发展与命运就必然会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王朝初创，统治者往往要用程朱理学来立朝纲、序尊卑，把它作为新王朝确立的重要精神支柱。而当王朝衰败，程朱理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衰落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在晚清遇到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在清代，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类似马鞍形曲折发展的过程，即在两个发展高峰的中间经历过一段较长的寂落期。清朝初期，以康熙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重用一批理学名臣，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如曾国藩所说：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波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鉅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①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汉学（考据学）兴起并成为一代显学，理学遭遇厄运，跌入低谷，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间，程朱理学才重新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加上朝野鼓吹，推波助澜，导致它在咸同年间的“复兴”。这是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程朱理学经历的这种衰而复兴的曲折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各种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因素错综交合作用的结果。

嘉道时期，清王朝曾经有过的“盛世”局面已经风光不再，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暴露，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接连兴起。有人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② 鉴

^① 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16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 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载《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于国势衰落，嘉道年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思想上的反思，寻找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当时许多人是从儒家正统的“德治教化”观点出发进行反思，认为社会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而根本原因则是程朱理学因受汉学压抑而多年不振，造成道德沦落、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乾嘉汉学因而受到一些学人的激烈批评。潘德輿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以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①

他发出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②的呼吁。他所说的“学术”是指“正学”，即程朱理学。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带有普遍性。陕西学者李元春说得更为明白：

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故横诋之亦大可惑矣。^③

他认为程朱理学独得圣人之道之精蕴，堪称“正学”，最具备充当拯救道德风俗的资格，而考据学不过“袭汉儒之学”的唾余，供雅士赏玩有余，于经国匡民无补。湖南学者刘蓉指责到：

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

① 潘德輿：《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卷十八，6～7页。

② 潘德輿：《与鲁通甫书》，《养一斋集》卷二十二，18页。

③ 李元春：《学术是非论》，《时斋文集初刻》，道光四年（1834）刻本，卷二，1页。

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莽莽，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有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①

这些议论和呼吁反映了嘉道年间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学术追求。它表明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政治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也是学术文化从过去的汉学一枝独秀，到各种学术思想竞起局面出现的转折点。这自然给程朱理学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讲求理学的风气在一些地区再度兴起。方宗诚曾对嘉道年间的理学萌动及理学士人的活跃作过这样的描述：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而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统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谿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②

这是就理学士人的个体活动而言，如果就学术群体的动态来讲，全国理学学者群体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有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陕西即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发源地。关学创始人张载即为陕西眉县人。明代，关中地区涌现出吕楠、冯从吾等理学家。清初，标榜理学的关中学者活跃一时，涌现出李颀、王心敬、孙景烈、王承烈等理学名儒。嘉道以后，关中理学依然名人辈出，代表人物有

^① 刘蓉：《复郭意城舍人书》，《养晦堂集》，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刊本，卷八，6页。

^② 方宗诚：《校刊何文贞公遗书序》，《何文贞公遗书》，光绪十年（1884）六安涂氏求我斋校刊本。

李元春^①、路德^②等人。李元春从读明代薛瑄的《读书录》入手，归依程朱，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俗学。他培养出许多潜心理学的弟子，如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等人，均为晚清关中理学的后起之秀。贺瑞麟评价李元春说：

桐阁先生之于关中，犹朱子之于宋，陆稼书之于国朝。宋以前诸贤之文章事迹，至朱子是一结局；国朝以前之文章道脉，至稼书是一结局。在关中前明时，冯少墟是一结局，本朝至桐阁先生又是一结局。其闻见之博，著述之富，真是不易得。^③

作为弟子，贺瑞麟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处，但也看出李元春在关中理学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程朱理学在安徽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尽管是一个散文派别，但却以孔孟程朱的“道统”为其文论的指导思想。其代表人物大都以服膺二程、朱熹，标榜理学为能，可称为振兴理学的一支友军。嘉道年间，桐城派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学术阵容。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谈到这一流派在全国一些主要地区的分布情况：安徽有方东树、姚莹、刘开、戴均衡；江苏有管同、梅曾亮、吴德旋；江西有吴嘉宾；广西有朱琦、龙启瑞、王锡振；湖南有曾国藩、孙鼎臣、吴敏树、郭嵩焘、舒焘、杨彝珍、欧阳勋等。^④当然，这仅仅反映了桐城派整体分布的一个侧面。这些人大多信奉程朱，写下了许多论文兼论道的著作，为理学复兴摇旗呐喊。他们当中，以方东树对程朱理学的鼓吹最为突出。方东树为扬宋抑汉而作《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全面抨击，指责汉学“视

① 李元春（1769—1854），字时斋，号桐阁主人，陕西朝邑人，举人出身，任知县、大理寺评事等职。辞官后设学授徒，迭主潼川、华原等书院。著有《诸经绪说》、《关中道脉书》、《学菴性理论》等。

② 路德（1784—1851），陕西盩厔人，进士出身，曾任军机处章京。归里后主持关中、宏道、象峰等书院。学宗程朱，主汉宋调和。著述有《怪华馆诗文集》等。

③ 贺瑞麟：《清麓遗语》卷三，《清麓丛书》，民国七年（1918）刊本，45页。

④ 参见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246页。

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下也”；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性：“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①。除《汉学商兑》外，他还写有《辩道论》激烈抨击汉学、陆王心学，竭力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理学争取了许多支持者。李兆洛曾说：“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案：指方东树）书，敬当力改其失。”^②自方东树以后，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一部分文学之士，如方宗诚、苏惇元等，都潜心于义理之学，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骨干力量。

河南是北宋二程创立的洛学发祥地，理学影响根深蒂固。清初，有“海内三大儒”之誉的孙奇逢曾在河南辉县讲授理学，主张调和程朱陆王，进一步延续了理学传统。其弟子汤斌为标榜理学的一代名宦，去世后被清廷赐谥“文正”。道光时，河南地区标榜理学者不乏其人，李棠阶、倭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徐世昌说：

中州理学之传，遂又阅二百数十年而弗坠。其居最后以儒修得大名者，则倭文端、李文清二公。二公当道咸之际，同以翰林洊登台辅。^③

其余讲求理学之徒尚有刘廷诏、苏源生、王检心等。

湖湘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异常活跃的一个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南的理学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在汉学风靡天下的乾嘉时期，程朱理学在湖湘学界的主流地位也没有被动摇。有人在谈到湖南当时的学风时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者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④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再度崛起，湖湘地区当仁不让，

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光绪八年（1882）四明花雨楼刻本，卷上，6页。

②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54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③ 徐世昌：《李文清公日记序》，民国四年（1915）石印本。

④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111页，湖南省文献委员会1949年编印。

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一区重镇。从学术队伍来看，湖南讲理学的名人众多，队伍庞大，著名者有：贺长龄、唐鉴、罗泽南、欧阳厚钧、胡达源、贺熙龄、刘传莹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执掌教职，带出大批门生故徒。欧阳厚钧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27年，执弟子礼者在千人以上。罗泽南多年假馆四方，授徒施教，生徒众广。咸同时期的不少“中兴”名将，如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溢澧等，都是罗门高足。曾国藩称赞说：“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案：指罗泽南）弟子也。”^①湖湘理学的影响还辐射到了全国。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标榜“义理经济”，风行全国，影响了一代学风。湘籍理学家唐鉴^②于道光中期内召为太常寺卿，京师的一些向慕理学的官僚士大夫从其就读，研习理学。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垵、邵懿辰等人，在北京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后来，这些人几乎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有人在谈到湘学时把贺长龄和唐鉴并称为“理学真儒”，说：“然善化自李恒斋而后，理学真儒世称贺、唐二公”^③。

总之，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和乾嘉汉学的退潮，为程朱理学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各地理学士大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呼朋引类，推波助澜，或者著文鼓吹提倡，或者授徒阐扬流布，在全国许多地区营造了崇尚理学的学术气氛，为程朱理学在日后的复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二、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契机

延绵于咸同年间的全国性社会动荡，为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

① 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305～306页。

② 唐鉴（1778—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由翰林历官太常寺卿。治学宗程朱，崇义理，以省身、持敬、力行为主，辨学甚严。著有《朱子学案》、《易臆》、《读易反身录》、《国朝学案小识》等。

③ 钱基博等：《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1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契机。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很快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义者利用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反对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尤其把孔孟儒学称为“妖书邪说”，严加禁止。太平天国当局颁发命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① 作为清王朝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受到起义者的猛烈鞑伐、亵渎，无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统治秩序的沉重打击，引起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恐慌。

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网罗士人，组织湘军等地主武装，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打出“卫道”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挽救人心，恢复被人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1854年初，曾国藩练成湘军率师出征，作《讨粤匪檄》为出师宣言，激烈抨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重申孔孟程朱所宣扬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②，号召读书人起来“卫道”。这表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满汉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大批读诗书、明义理、效忠于朝廷的人才来挽救封建治统和道统的危机。然而，面对这种危局，八股之士、考据之徒，显然是不堪任用的。理学之士是否靠得住，清朝最高统治者鉴于理学以往负有“迂拘”、“空疏”的“恶名”，尚存犹疑。1853年5月，咸丰帝召见向好程朱理学的大臣吴廷栋时，君臣之间有过一段颇值得玩味的对话，很能体现最高统治者与理学儒臣间的微妙关系，兹录如下：

上曰：“汝尝读何书？”对曰：“臣尝读程朱之书。”上曰：“何尝学程朱者多迂拘？”对曰：“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

① 《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31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②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232页。

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上曰：“汝识曾国藩否？”对曰：“曾国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实早与相识。其人励志不苟，亦是杨大洪一流人材，虽近言近激，而心实无他。”上曰：“汝识倭仁乎？”对曰：“臣亦早与相识，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平日专在身心检察，日自记载以为考验，尤佩其笃实，其守道似近迂而能识大体。”……对曰：“……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又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深宫寤寐旁求，则辅相得人。辅相进贤待用，则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得人。部院督抚各择其属，则内外司官州县无不得人，斯贤才出矣。”①

这段对话，一方面反映出咸丰帝既要选拔人才救急，又信不过理学士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从吴廷栋推崇程朱理学，称赞曾国藩、倭仁的应对中也可以看出理学士人跃跃欲试、急于一逞的迫切心态。咸丰时，清政府不但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徘徊、举棋不定，而且还不时对理学士人进行排斥。以理学相标榜的李棠阶、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不是归籍闲置，便是差派边远，不授实权。笃信程朱的倭仁于仕途一再蹭蹬，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叶尔羌“历练”。一向处世谨慎，屡立成功的曾国藩长期不受朝廷重视，未授权柄，吃尽了官场倾轧排抑的苦头。然而，这种情况到1860年发生了变化。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朝江南大营，清政府所倚重的正规军——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无力与起义军对抗，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阶级的地方势力武装——湘军，这就给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以崛起的机会。是年6月，清政府以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次年11月，清政府破例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

① 吴廷栋：《召见恭记》，《拙修集》，同治十年（1871）六安求我斋刻本，卷一，4~6页。